

周玉官到河南开封去开了一片服装店，但蚀了本。1991年形势稍好，恢复电子元件生产，他也改变了原来的管理方法，将原料发给工人，让他们在自己家里加工产品。同时，在盛泽东方丝绸市场内设立了一个经营部，与几家大的丝织厂建成业务联系，贩运白厂丝。1992年，周玉官又回到村里经营电子元器件作坊，与父亲、丈人合作，改外发加工为厂内生产，雇了三个河南青年，年产值30万元，向国家纳税1万元，发给工人2万元。1993年，他参照外国产品，自行设计、自行试制成可以随身携带的民用报警器，雇佣工人已增加到20人。1994年产值达到100万元”^①。这些材料来自倪明参与珠王怀冰老同志的实地调查。当时，周玉官是小生意不为人知，不像现在已是江村第一号人物了。但这些材料是宝贵的，用周玉官对我说的话来讲，“幼苗的成长是不容易的”。目前，大局的稳定，归根到底，还是靠“最主要、最活跃的因素”——“省吃俭用、勤劳耐苦的农民”。

费老一生的希望或工作的重点是认识中国社会，首先是农村，江村是起点。先生快90岁了，雄心未了。我们能帮助先生不断地工作下去吗？“此心谁料，身在沧州，心老天山”，好在我们不是陆游，虽然双鬓已白。

参考文献

-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7。
 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
 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费正清文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64。
 荣敬本等：《县乡两级的政治体制改革 如何建立民主的合作新体制》，《新华文摘》1997年12期。
 沈关宝：《一场悄悄的革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东方出版中心，199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吴江市委员会编《江村—江镇—庙港发展的脚步》，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实地研究方法论的再思考：*Earthbound China* “导言” 读后

刘能*

人是容易健忘的，因此重读总是带来惊喜和反思。回想1996年，为纪念费先生从事学术活

^① 费孝通：《江村五十年》，未出版，1986，第148~149页。

*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系副教授。



动60周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了第一期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并出了一本文集,就是天津人民出版社三卷本的《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潘乃谷、马戎,1996)。这本文集上册的第一篇文章,便是费先生的那篇《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费孝通,1996)。在这篇长文中,费先生所谈及的核心话题之一,是对运用社会人类学(或社会学中国学派)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可行性和研究策略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反思。这个反思带给我很大的启发,并引导我对实地研究的方法论一直产生浓厚的兴趣(刘能,1998b;2005)。

1997年春天,我还在研究所做博士生的第二年,潘乃谷教授交给我一个稿子,是费先生1943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访学时,在《云南三村》中文版基础上翻译出版的 *Earthbound China* (Fei, 1945) 一书的“导言”和“结论”部分的英文复印件,让我翻译出来。译文完成后,由于当年还没有个人所有的电脑,因此译稿的电子版最后不知道遗失在什么地方,成为我的一大憾事。2005年4月先生与世长辞,我远在美国加州的Berkeley访学,未能到灵堂吊唁,又留给我无限的遗憾。逾6月份回国,在北郊新居内整理书房内零乱的书籍文稿时,当年翻译稿的底稿竟飘然出现,宛若神迹。重读稿子,再联想到费先生十年前的那篇“重读”,就引发了我今天的这个话题。

一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的方法论议题

费先生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所提出的方法论问题,主要包括如下三个议题:①社会人类学方法能不能研究像中国这样的文明社会?②来自本土的学者,能不能在本文化中做社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并取得出色的成果?③如果社会人类学方法可以研究中国社会,中国本土学者也能够研究中国文化和社会,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论策略?典型社区的田野工作,或者Raymond Firth所说的“微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能不能达成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且多样的文明社会的全盘了解?

1. 社会人类学方法能不能研究像中国这样的文明社会?

在马林诺斯基为费先生的《江村经济》(Fei, 1939)所写的“序”中,引到了马氏早先的一个提法,即“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费孝通,1996:4)。到20世纪60年代Maurice Freedman提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时候,实际上表明了社会人类学方法可以应用于对中国这样的、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发达文明社会——与人类学传统的关于“野蛮人”的研究相对应——的研究。究其主要原因,费先生认为:“我不能不想起就在这三十年里发生过震动全人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使大英帝国瓦解了,世界各地被殖民压迫下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放。人类学者还想用过去那种气势凌人地到原来殖民地上的人民中间去进行所谓调查研究的田野作业,免不了要受到闭门羹了。这是大势所趋,人类学这门学科要能继续生存下去,就得另辟路径,开拓新的研究园地。”(费孝通,1996:5)

2. 中国本土学者能否在本文化中做社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

同样,在马林诺斯基为《江村经济》所写的“序”里,赞扬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地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费孝通,1996:7)。尽管同为马氏后人的利奇教授“根本不赞成一个初学人类学的人从研



究自己的民族入手……怀疑本民族的人从研究本民族能进入社会人类学的堂奥”（费孝通，1996：8），但费先生从自己的实地田野工作的体验出发，认为本土学者研究本文化获得成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生平说得上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广西金秀瑶山，第二次是在江苏江村，第三次是在云南禄村。这三次都可以说是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但是第一次我是汉人去研究瑶人。……江村离我出生的吴江松陵镇只有十多公里，同属一个县城，两地居民说是同乡……但是他们讲的话我又很多听不大懂。……禄村是我一位燕京大学同学的家乡。他和禄村的关系有点近于我和江村的关系……无论如何我和禄村居民又隔了一层，本村人间用本地话进行的闲谈杂语，我根本听不懂。……如果我自己把这三次田野工作互相比较，我对所接触到的人、事、物能心领神会的程度确是不同的。在江村，基本上我不必通过第三者的帮助就能和对方交往，在禄村就不能那么随心所欲了，在瑶山里我离不开能说汉语的人的帮助。如果社会人类学的田野作业离不开语言作为取得认知的工具，我实在不能同意 Leach 所说的在熟悉的田野里工作，比在不熟悉的田野工作更困难的说法。（费孝通，1996：17~18）

3. 什么才是研究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恰当方法论策略？

综上所述，前两个方法论议题的结论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社会人类学方法不仅能够用来研究中国社会，而且中国本土学者也能够很好地研究中国本土社会。但第三个议题，即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论策略，则还一直遭受着典型与概括间的困扰。《江村经济》一书，被马林诺斯基看作是“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而 Raymond Firth 教授也提出了微型社会人类学方法——这种方法指的是“以小集体或大集体中的小单位为研究对象，去了解其中各种关系怎样亲密地在小范围中活动”（费孝通，1996：9）——并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渔村里实践了自己的这个方法论立场（Firth，1946）。但是责难也随之而来，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利奇教授：一个人数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复杂的民族或国家，只研究其中的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小社区，能不能了解这个民族整体的社会文化？（费孝通，1996：13）

费先生对利奇的这个责难，首先在他的《人的研究在中国》（费孝通，1993）一书中进行了回应，提出了用“逐渐接近”的手段来达到从局部到全面的了解的解决方法。除此之外，更为具体地，费先生又提出了“类型”和“模式”的概念，来阐述社区研究的方法论立场：“后来我又提出在云南内地农村调查的实践中采用的‘类型’的概念，和在90年代城乡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提出了‘模式’的概念，对局部和全面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修正。……以江村来说，它虽然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农村，但是确有许多中国农村由于所处条件的相同，所以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同的‘类型’或‘模式’。”（费孝通，1996：13~14）

对于费先生的这三个回应，我个人认为，“类型”概念的提出，是最具力度的方法论立场。由于费先生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并没有就这三种回应做出具体的阐述，而 *Earthbound China* 一书的“导言”中恰好较完整地表述了先生关于文化类型学的立场，因此，



这就提供了我在这里从《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转向《重读〈云南三村·导言〉》的一个契机。

二 *Earthbound China* “导言”中的方法论议题

在 *Earthbound China* 一书的“导言”和“结论”中，有多处地方可以看到芝加哥学派对费先生的影响。首先，在发展他的文化类型学概念时，很明显是受到了派克教授的女婿 Robert Redfield 的研究 (Redfield, 1941) 的影响。其次，在该书的结论中，费先生反复提到了芝加哥学派的一个核心概念——情境定义——用于说明，在云南三村和江村的研究中所得到的概括性结论，都是对情境的重新定义，因此可以在参考当时中国的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前提下，为改善中国农民的生存困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建议，即农村合作化工业。

在 *Earthbound China* 一书的“导言”中，与本文直接相关的主要有如下两个方法论议题：①关于农村社区研究的社区分析方法和社会调查方法之间的对立；②作为社区分析之基础的文化类型学的内涵和应用。

1. 社区分析方法和社会调查方法的对立

Earthbound China “导言”开篇就直指社区分析方法和社会调查方法之间的差别，用来指明《云南三村》对土地所有权和租佃关系这个理论问题的关注，是搞清楚中国农村社区中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地利用结果的必要前提。费先生首先指出，《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力》(Tawney, 1931) 一书，是当时了解中国农村社区经济最好的一本书，而他的理论推理所使用的资料，则是通过社会调查方法获取的。因此，话题就转到了使用社会调查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土地利用情况的 J. L. Buck (卜凯) 教授身上：“卜凯的《中国农业经济》(1930) 和《中国的土地利用》(1937) 目前仍然是中国农村经济领域最负盛名的著作。在第一本书里，他研究了 7 个省 17 个地域 (localities) 的 2866 个农场；而第二本书，则涉及了 22 个省 168 个地域的 16786 个农场。这些里程碑式的作品所做出的贡献是伟大的。它们不仅为农村经济和土地利用领域的各种各样的话题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而且奠定了使用社会调查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作为一个其兴趣主要在于提高土地的经济产出的农业专家，卜凯是从技术层面出发来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因此，他明显不感兴趣的土地所有权和租佃关系，被看作次要的问题。……然而，我们应该问一问，不考虑农村问题的制度化背景，我们的研究可以走多远？”

从费先生随后的评论来看，卜凯所使用的社会调查方法所具有的最大危险，在于这个方法所带有的、忽视单个事项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即制度化背景的危险：“当卜凯得出这些结论的时候，他不仅假定了在中国和美国租佃关系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且把租佃关系这一问题，同其他拥有丰富资料的根本性事实，比如农田规模、土地租率、生活标准、营养状况等，分离了开来。”

因此，在费先生眼里，用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方法来采集数据时，需要对与所要研究的对象有关的社会制度背景有一个完整的了解，而这样一个理想的研究方法，就是社区分析的方法：“在我们对太湖周围地区的农村经济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土地租佃中的不在地主制的发展，是同农村工业的衰弱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农民依靠作为家庭手工业的纺织业来维持生计，因此纺织业的衰弱导致了农户家庭出现财政危机。农民只能出卖土地以免于饥饿。……因此，看起来土地集中在市镇居民手里的主要原因，是农村手工业的衰败。如果



土地贫瘠，仅能保证耕种者维持一个糊口水平，也就不可能产生租约，市镇里的不种地的人也不会购买土地。但是在这里，土地的肥瘦只是形成租佃关系的一个可能条件而已，而不是直接的原因。……很明显，造成不在地主制度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进程，不应该主要由土地的相对肥沃度来解释。一个扎实的研究，应该从土地买卖的制度化背景开始。这导致了对土地利用、劳动力状况、土地所有权的分布，以及耕作利润、经济态度、继承权，和各种各样财富积累的渠道的调查——一言以蔽之，要做一个社区分析。”

费先生又把这种社区分析称为“密集式的田野研究”，这种密集式田野研究的特点在于它的综合性：“从研究较为封闭、整合得较好的所谓‘原始人的社区’开始，社会人类学家逐渐意识到了研究社区居民的全部生活的重要性。生活的不同方面——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教育的——之间的相互关系，长久以来受到了许多系科化了的（Departmentalized）社会科学的忽视，因此必须在一个较少专业化或分化的社区中，被一一地辨识出来。”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的后记里，费先生展望了社会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科学的前景，即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为研究对象，凸显各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再次清楚地对社区分析进行了界定：“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每一个社区有它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也称作社区分析。”（费孝通，1985 [1947]：94）

与此相对应，费先生也指出了采用大样本数据采集的社会调查方法，有可能存在如下的缺点：①忽视研究对象所处的不同社会情境中的制度化背景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概念误用，如美国的佃农和中国的佃农的社会意义存在根本的区别；②该方法所使用的问卷，很可能是在缺乏对所观察的社区之结构有一个完整认识的情况下制订的；③问卷调查所使用的资料收集者往往是非专业的、被雇用来的助手。这三个方面的不足，导致了卜凯教授的某些调查数据和由此得出的调查结论，出现了无法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相符的致命缺陷。但在我们今天的实地研究中，审慎且温和的社会调查方法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将在第三部分做出阐述。

2. 文化类型学：理论问题引导下的分析框架

上节我已经提到，费先生本人在 *Earthbound China* 一书的“导言”中，把密集式社区分析的方法看作是研究中国农村社区的社会经济情势的合适方法。但费先生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人类学家使用密集式田野作业方法时，他们必须以控制自己的研究范围为代价，因为要想完整地研究社区生活和这种社区生活背后的制度化内容，研究者必须把他的参与式研究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因此，除了利奇的那个关于代表性的本体论问题——密集式社区分析所提到的理论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演到整个中国的农村社区——之外，社区分析方法也还面临了一个很实际的方法论问题：对每一个社区做密集式研究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更为甚者，对特定社区的描述性研究，不仅不能做到绝对的完整性，而且除非它与某个理论概念相关，否则将没有任何意义。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方法论的和本体论的问题，费先生在 *Earthbound China* 一书的“导言”中提出了一个“文化类型学”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了以下四个层次的含义：①界定文化类型的特征，是参照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和兴趣来选定的，因此，每一个文化类型学都对应着一个理论问题，尤其是关于功能相互关系或关于社会变迁的一般性问题；②每一个文



化类型学本身就隐含着一个理论假设，研究者的田野工作就是去检验这个理论假设，因此，在进入田野之前，研究者是有着充分的理论准备的；③界定文化类型的特征，往往是指导社区分析的制度性概念，如经济制度的不同维度，比如租佃关系的形态、土地所有权，或社会制度的不同维度，比如家族控制力、仪式实践的中心性等；④一旦在某个理论问题的指导下，研究者依据某个制度性概念，建立了某个文化类型学，那么单个的密集式的社区研究就成了某个社区类别的代表，而获得了它的典型性和理论上的概括力。具体而言，费先生是这么来阐述《云南三村》所使用的文化类型学的策略的：

为了研究土地所有权，我们选定了四种类型的社区。它们被用来代表不同程度的土地集中状况。在其中的一个社区，禄村，大多数土地所有者就是耕作者本人，而且他们的农田面积很小。在另一个社区，易村，除了几个在别的村子也拥有土地的大地主之外，其余的都是小自耕农。村子里没有佃农。第三个社区，玉村，与第二种类型正好相反。村子里有许多佃农，而土地所有者则住在附近的市镇里。这三个社区都在云南。第四个社区，本书没有涉及到，但同样可以用作比较的是我们在江苏研究过的那个社区，在早先出版的《江村经济》里，有过详细的描述。这是一个由租种大市镇上的不在地所有者的佃农组成的社区，有比第三种类型更为发达的租佃关系。……在分类学的层次上，特别参照了社区的土地制度来界定社区的特征。在考虑了由一般因素——比如，人口压力、低水平的职业分化、雇佣劳动力的手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出现，等等——所表达的所有基本特征之后，我们就可以界定社区类型，并以此作为我们对中国农村社区进行分类的基础。

这项建立在文化类型学基础之上的社区比较研究，其出发点在于费先生的如下一个理论尝试，即通过展示上述四个村庄中的村民在各自村庄的土地体系中的相互关系，通过把村民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联结起来，对中国农村社区中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租佃关系的发展，与工商业入侵这一社会的变迁过程之间的关系，做出理论解释。最后，利奇的那个本体论问题，即单个的社区分析，能否达成对整个中国农村社区的概况的说明也就得到了回答。

本书并不想声称是对中国土地状况的一个完整把握。但是，通过采纳这种建立并分析土地制度的基本类型的方法，我们相信这一工作将逐渐完成。这并不需要对中国的每一个村庄的彻底的研究，因为大多数村庄都可以被归入到已知的类型之中。

三 上述两个方法论议题的当代意义

从费先生的《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出发，我再次老生常谈，将实地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和方法论策略放在了讨论的中心。我对先生 *Earthbound China* 一书的“导言”的重读，同样有着欣喜的发现，即先生对社区分析方法与社会调查方法之对立的阐述，以及他所提出来的建立在文化类型学基础之上的密集式社区分析方法，在当代社会研究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文化类型学方法，对于解决典型和概括之间的两难困境，不啻于一把利刃。也许其他研究者会认为我是在炒冷饭，但我还是想在这里强调一下，上述两个方法论议题，



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研究实践，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1. 文化类型学和理论取向的研究

如上所述，费先生在 *Earthbound China* 一书的“导言”中所提出的建立在文化类型学基础之上的社区比较分析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利奇的责难和质疑，而且也为我们的实地研究奠定了理论生产的方向。换句话说，密集式社区分析的目的并不是在描述，而是在解释。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模式”概念之所以不如“类型”概念更具力量的原因。“模式”概念指导下的研究，关注的更多的是描述性的特征，而不是在某个特定的理论问题引导下的理论取向的探究。这一点，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因为没有理论问题和隐含的理论假设，研究就只不过是一场低质量的智力活动而已。唯一可惜的就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费先生中断了他的学术生涯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因此，马林诺斯基早在1939年撰写《〈江村经济〉序》时就预测过的那个研究历程还没有完全展开，就已经戛然而止了。

在这本书中，集中力量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方面。……他打算在以后的研究中说明关于祭祀祖先的详细情况以及在村庄和城镇中广为流传的关于信仰和知识等更复杂的体系。他希望终有一日将自己的和同行的著作综合起来，为我们展示一幅描绘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的丰富多彩的画面。对这样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像这本书这样的专著当是第一步。^①（费孝通，1996：20）

对于这一点，我本人曾经在博士论文的前言中，做过这样一个评价：

自《江村经济》以降，费先生的研究方向和主题极其明确。《江村经济》描述了在国内都市势力和外国商品倾销的压力之下苏南农民的生活抵抗和调适，其基础是传统的农工相辅的经济模式和现代产业技术的应用。《云南三村》则是同一问题在不同地域的检验：乡村和工业化的关系究竟如何，不同类型的农村其生存的方式和能力如何，对于外来势力的入侵会如何抗拒。问题框架中的其他要素还有：人均土地占有、土地产出水平、租佃关系、剩余劳动力及其机会成本、生存压力和产出的边际化、资本和工商业机会以及新的工业型式，等等。恢复社会学以来费先生所做的研究也一直贯穿了这条主线。通过不懈的实地考察，他可以对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乡村工业模式做出追踪式的调查，并从中分离出几种模式来，这些模式一般也可以由上述问题框架中的要素体系来做出初步的解释，加上一个“内生型发展”的理论前设，而这一前提，本身也可以从不同类别的乡村面临生存压力而做出的不同反应中（特别是在前两本著作中）看到雏形。我自己阅读费先生著作的一个感觉是，如果没有长期的学术间隔，他的理论成果将更为丰富，他早年后所关心的城乡新型关系问题也会早有结论。真是如此，恐怕黄宗智现在很出名的几本书也不会那么有名了，因为黄著所牵涉的理论问题很早就由费先生阐述过

^① 除了《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之外，费先生的《乡土中国》（1947）、*China's Century*（1953），以及他和他的工作小组在呈贡魁阁时期的工作成果（参见谢泳，1997），可以看作是马林诺斯基所说的这一部综合性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了,尤其是在 *Earthbound China* 的“导言”和《内地农村》的某些篇章中。(刘能, 1998a: “前言”)

2. 社会人类学个案研究和大规模定量研究间的密切关系

在当代社会研究中,我们应该把作为定性研究的社会人类学个案研究和作为定量研究的大规模问卷调查结合起来,共享这两种方法各自的优势。前面我们已经提过,肤浅的社会调查方法能够对研究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但是当我们以密集的个案定性研究来弥补了肤浅的社会调查方法对制度性背景的忽视之后,社会调查方法的优势——对理论图景的全面把握和理论关系的检验——就显示出来了;而当最初的社会调查揭示了宏观的理论共变关系之后,运用密集式的个案定性研究,则有助于揭示勾连共变变量的中介作用机制。

(1) 理论图景的全面把握: 定性先行, 定量跟进

在2005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这样表述过我自己的实地研究方法论立场,该立场由两个观点组成:①首先,随着研究所关心的问题的不同,或者随着研究所预期得到的产品的不同,无论是定性的方法,还是定量的方法,都是策略性选择的结果;②为了纠正纯粹定量研究方法的内在局限性,在决定选择定量研究手段来获得最终研究产品时,应该在研究的初期,密集地在本体论意义上使用定性研究手段作为采集本土信息的手段。换句话说,作者的实地研究方法论策略,是以定量推论为目标的,但在研究过程的初期,却整合了定性研究手段的这样一种取向,可简单地称其为“定性先行,定量跟进”的策略。我的这个立场,可以具体用表1来加以阐述(刘能,2005: 63~64)。

(2) 细部机制的具体解剖: 定量发现共变关系, 定性揭示作用机制

在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的思路又有了新的拓展。具体来说,表1所例证的“定性先行,定量跟进”的研究策略,实际上只是对实地研究过程的某一个特定时段的描述:当研究者所选择的研究领域还是一个新生的领域,理论积累较少,或者当研究者本人对所要研究的对象还比较生疏;换句话说,当研究本身还处在一个初始阶段时,为了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情境中所有相关的重要制度性背景,在采取大样本的社会调查方法

表1 定性研究手段作为以定量分析为目标的实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常用定性手段	解决定量分析的哪些问题	为后续定量分析提供哪些初级产品
参与式观察	对研究对象(基本分析单位)的“生活世界”的系统观察和了解,促成研究者在实地研究时空中的再教育。	初步明确研究问题,或把研究问题转译成本土语言; 初步明确研究问题所涉及的核心因变量组群和自变量组群。
焦点小组访谈	研究者和一组研究对象展开深入对话,以便围绕研究问题获得相对稳定的“集体情境定义”。	明确研究问题,使其通过一个集体共识的建构过程而得以相对固定化; 初步找到研究变量的本土化操作指标。
开放式访谈	研究者和一个研究对象展开深入对话,以获得与该研究对象的社会属性相对应的“扎根客观性”。	进一步了解到研究对象本身是如何阐述研究变量的,从而积累一系列具体化研究变量的本土化操作指标的分类框架。



获取全景式的理论图景之前,采取密集式定性社区分析的方法,是确保后续的社会调查方法获得其效度的必要前提。

但是,在研究者已经对某个研究领域有了一定的理论认识的积累,或者说,当研究者运用“定性先行,定量跟进”的方法论策略,已经获得了多组变量之间存在的共变关系之后,对于某些特定的共变关系来说,连接两个或多个变量之作用方向的具体工作机制,或者连接两个或多个变量的隐含中介变量,则还可以采用密集式定性社区分析的方法,具体地揭示出来,从而解决了由初始的大规模定量研究所揭示的多变量共变关系所预示的作用力“转译”问题,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通过哪些具体的微观机制得以实现的。图1以简约的形式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相互渗透的情形表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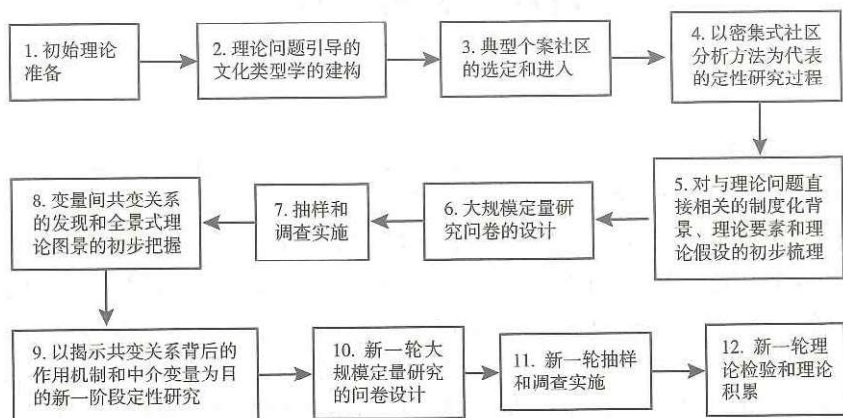


图1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一个理论研究循环

参考文献

- 费孝通:《乡土中国》,商务印书馆,1985 [1947]。
-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载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 刘能:《乡镇行政:北园镇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系博士论文,1998a。
- 刘能:《关于研究方法:读重读〈江村经济·序言〉有感》,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1998b。
- 刘能:《实地研究的方法论策略:以农村消费实践的研究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 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 谢泳:《魁阁:中国现代学术团体的雏形》,《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1997年6月总第7期。
- Buck, John L. 1930. *Chinese Farm Econom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37.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Fei, Hsiao-tung. 1939.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London:



Routledge.

- . 1945. *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53. *China's Gentry: Essays in Rural-Urban Rel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irth, Raymond. 1946. *Malay Fisherman: Their Peasant Economy*. London: Kegan Paul.
- Redfield, Robert. 1941. *The Folk Culture of Yucat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awney, R. H. 1931.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再读《云南三村》

► 张宏明*

相比于费先生早年出版的广为人知的《江村经济》，《云南三村》的知名度要小得多。其中一个原因，或许与《云南三村》的出版经历有关。与《江村经济》的出版经历类似，《云南三村》也是于1945年先在国外出版了英文版 *Earthbound China*（《被土地束缚的中国》），然后直到1990年才在国内出版了中文版《云南三村》。但与《江村经济》不同的是，《云南三村》并非译自英文版，而是直接收录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以及《玉村农业和商业》这三个云南农村的调查报告。因此，中文版完整的《云南三村》是在1990年才正式出版的。

此前，《禄村农田》和《易村手工业》都只作为单独的农村调查报告出版过，而《玉村农业和商业》则一直没有付梓。不过，《云南三村》虽然是三篇农村调查报告在汉语学术界的首次完整出版，也首次体现了费先生当年设计这三个云南农村调查的完整思路，但其中缺少英文版中总括性的“导言”和“结论”，不能不说是保持研究完整性方面的一大缺憾。幸好于1999年出版的《费孝通文集》弥补了这一缺憾。时至今日，重读半个多世纪前的这本旧著，很难只依据当下的学术风尚对其进行简单的评判，而是希望能够跨越时间的沟壑，去展现《云南三村》在费先生学术发展史中的来龙去脉，间或去思索费先生投身于其中的“乡土中国”的命运。基于此，这里所读的《云南三村》，虽然将主要关注费先生亲自撰写的《禄村农田》，但出于保持研究完整性方面的考虑，也会顾及其学生张之毅所撰写的《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以及英文版中总括性的“导言”和“结论”。

《云南三村》是费先生学术发展历程中承前启后的一部重要著作。说其承前，乃是费先生不止一次地提到《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之间存在着源与流的关系（费孝通，1999a: 221、413；1999b: 137）；说其启后，则是在《禄村农田》中，费先生开始采用一种不同于《江村经济》的研究方法，并将其贯穿于整个《云南三村》的研究中，其影响一直持续到80年代的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这种研究方法就是“社区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类型比较法”。费先生对此种研究方法非常重视，分别在《禄村农田》、*Earthbound China*的“导言”以及1987年给《云南三村》所写的“序”中予以专门的论述。

* 中共中央党校社科部副研究员。

